

浅议社会性别学在中国的发展

王 政

Abstract: Schola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ve been engaged in research on women since mid 1980s. The term “women’s studies”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since 1982 and many associations of women’s studies have been formed since then. However, the lasting interest in research on women has neither resulted in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nor created gender studies as a legitimate academic field.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factors that have affected the development of gender studies in China.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conservative trend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mainstream in the reform era, and analyzes male intellectuals’ role in reproducing and consolidating gender hierarchy as a response or rea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ic and gender policies of the Mao era.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creating women and gende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政府签署的《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两个联合国文件的精神在国内传播,“把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成为各级妇女组织和妇女研究者的努力目标和熟悉话题。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种分析范畴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妇女研究者所掌握,社会性别意识培训也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推动社会性别进入各阶层决策者和领导者的视野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社会性别作为国际学术界中的常识性概念,对我国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来说却十分陌生。绝大多数学者尚不了解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在国际上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和教育领域的状况。尽管在80年代初期“妇女学”一词就传入我国,在80年代中期妇联的理论工作者和学界关注妇女研究的学者都呼唤过建立妇女学,在80年代末我国高校中出现了妇女研究中心,但是,时至今日能够开设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跨学科课程的高校寥寥无几。^①热热闹闹的妇女研究并没有在高等院校打开社会性别学的教学天地。从总体上说,社会性别学尚没有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教育界中建立起来。在改革开放20多年的过程中,中国学术界引进了多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创建了许多新兴学科,但是为什么社会性别这个当代国际学术界重要的学术领域却一直没有能被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关注呢?本文将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初步分

① 笔者能查到的对妇女学最早的译介是日本的白井厚所作,《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何培忠译,《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4期)。我国研究者在这一时期的呼吁文章有:上海妇联干部李敏的《谈谈妇女学》(《社会》1984年第3期),社会学家邓伟志的《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妇女指南》1985年第4期)和《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报》1986年1月27日),以及内蒙古妇联干部奚杏芳的《建议开展“妇女学”研究》(《中国妇女》,1985年第12期)。这些呼吁文章中对西方妇女学的了解基本上建立在1982年那篇译文的内容上,都谈到妇女学是多学科的新兴学科,但是没有提到社会性别是妇女学的核心概念,也没有指出在国外妇女学是在高校中具有专门的教学机构和课程设置的学科。1987年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妇女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这是国内学者创建妇女学的首次集体行动,并随后出版了由李小江主编的《妇女研究丛书》。但是在这一个时期国内对国外妇女学的核心概念、分析范畴、内容及各种理论方法都缺乏了解(见陶钰柱,谭深,1987)。

析,并探讨在中国发展社会性别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社会性别学的产生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发展

当代的社会性别理论诞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西方女权运动中。投身于女权运动的学者们社会上向男女不平等的现实挑战的同时,对在男权文化中产生的西方知识体系开始质疑。她们审视的眼光不仅看到了妇女在知识体系中的缺失和受贬抑,还看到了知识生产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看到了社会性别作为人类社会中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原则是以往学界研究所忽略的,看到了由这种忽略导致的人们作为常识接受的许多理论的偏颇和谬误,看到了这些偏颇和谬误在巩固妇女从属和边缘地位中的巨大作用。作为思想和文化运动的实践,女权主义学者在各个学术领域中开始了认真细致的清理,把社会性别的棱镜引进历史、文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一系列学术领域,对西方各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正如伯克利大学教授卡罗·克利斯特所指出的:“(今天)任何评论者要对一篇文章提出全面的评论,都必须考虑到社会性别;同样,社会科学也必须思考社会性别形成和影响了研究者所使用的数据材料。”(Christ, 1999: 33)总之,女权主义学者对西方知识体系挑战的一个显著成果是在学术界建构起了社会性别理论和分析方法,创立了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教学机构,向各个学科领域作了积极有效的渗透,从而改变了众多学科领域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阐释(Boxer, 1998, 2000)。

过去 30 年间西方女权主义的学术成就之所以辉煌,除了有大批女学者投入的首要条件外,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条件是整个西方学术界反思西方知识体系的大气候。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就是这种反思反省的学术表现。这些学术表现不仅体现了西方知识界独立思考的传统,也反映了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左派在学术界的政治影响。在对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分析中,上述主要学术流派的关注点是在如何反对霸权。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学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批判同西方学术思潮主流没有逻辑上的矛盾。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是受左派影响的西方学者所无法推卸的道德责任。在学术界,对西方霸权和男权的解构批判互相影响、互相交融,这种反霸权的批判性思维使国际人文社会领域在过去 30 年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由学界在妇女运动的实践呼唤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性别理论一经出现,便同时在学术界和妇女运动两个领域中产生深远影响,在与各种学术思潮的交融中、在妇女运动的多样化实践中获取营养和生命力,不断丰富深化、推陈出新。在世界各国,包括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学术界尤其是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学者们,是推动社会性别理论在本土发展的主体,高等教育领域也是传播社会性别理论的主要场所。高校中的妇女学系和中心是用社会性别范围创造新知识和教育年轻一代的基地,还有各种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以及社会性别学术刊物专门投入新的知识的创造和将社会性别纳入学术和教育主流的有效工作。以美国为例,目前在高校内外有 250 多个研究所、700 多所高等院校有妇女学系和中心,每年向学生开设 3 万多门同社会性别相关的课程,全美有 12% 以上的高校学生获得妇女学课程的学分,有 6 所高校授予妇女学博士学位,培养跨学科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专家。许多学校授予妇女与社会性别学和其他领域的联合博士学位。到 1995 年,在各个学科中以写妇女和社会性别专题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达 10 278 人(Boxer, 2001);在欧洲,截至 1995 年的统计,有 150 所大学开设 600 门妇女学课

程,有9个国家授予妇女学学士学位,10个国家有硕士学位,其中9个并授予博士学位(闵冬潮,2000)。在亚洲,韩国也已经有了18年的妇女学课程设置历史,并早有了硕士和博士点,培养了大批妇女与社会性别学专家。有的在大学任教,有的在妇女组织做领导,有的在传媒界供职,从各个方面努力创造新型的社会性别话语和社会性别关系。总之,在国际妇女运动把社会性别概念纳入联合国文件之前,社会性别已经进入了许多国家的学术界和教育体制。社会性别也早已成为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析范畴,经常同阶级、种族、族裔、性倾向等等分析人类社会等级制的范畴并列使用(王政、杜芳琴,1998:6)。

二、社会性别关系变迁与中国知识界

在西方学者初创社会性别学的阶段,我国学者尚处在文革的封闭状态中。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东西方学术交流相当频繁,中国知识界对介绍引进当代西方学术思潮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都曾经是中国人文学者的热门时髦话题,惟独女权主义学术难以进入中国学术精英的视野。对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学术现象,笔者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做一个初步的社会性别分析。

同西方学界的主要政治倾向相反,过去20多年我国学界是以反“左”为主要任务的。尽管我们所说的“左”同西方学界认同的“左”的内涵大相径庭,但是在我国学界反“左”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对某些表达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理念原则的不屑与摒弃,比如,男女平等。否定男女平等的思潮在文革结束以后的思想解放潮流中就出现了,当时它夹杂在对文革时期“男女都一样”的政策批判中。学术界和文化界对此表现了极大的热情,生产了许多影响广泛的文本,它们所表现的形象和比喻很快进入当代社会性别话语,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至今都对当时文化界对“铁姑娘”的嘲弄和否定记忆犹新,在80年代的批判话语中,“铁姑娘”是中国女性在男女一样的政治时期人性被扭曲和男性化的象征。^①这一时期的批判对毛泽东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起了解构作用。批判锋芒所向,不仅是男女都一样的装束、工作、工资,还包括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张晓崧,1998;潘锦棠,1988)。

80年代中国知识界解构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热潮是由男女知识分子一起参与形成的。当时许多男女知识分子的写作造成了广泛影响,比如“中国妇女解放超前论”和“恩赐论”(李小江,1986);也有一些女性像男性一样赞美“东方女性传统美德”,呼吁女人要回归“女性”。但是深入分析那些积极解构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有影响的著述,还是可以看到男女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和角度有所不同。对城市知识女性来说,以男性为准则的妇女解放(其经典的表达是“男同志能办到的,女同志也能办得到”)令她们感到不堪重负。这不仅是因为她们在背负传统女性家庭角色的同时被要求在社会上承担同男性一样的责任,还因为在以男性为准则的国家界定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妇女无法表达自身的多样需求和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使她们获得了表达和界定自己的利益需求的可能,80年代中国知识女性对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话语的批评是她们开拓社会空间的一种方式 and 途径。在这个过程中,妇女问题从“阶级”的遮蔽下突显出来。虽然中国知识女性当时还不了解社会性别这个概念,这使得她们的批评往往

^① 1986年北京的一次妇女问题讨论会上,一些关注妇女问题的男性学者依然在表达对“铁女人”和“假小子”这类形象的强烈反感,认为这是“女性的变异”(见孟晓云,1986)。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在21世纪的今天仍有许多学者把“男性”“女性”自然化、刻板模式化。

缺乏对男性中心文化主流话语的警觉和剖析力度,但是社会性别问题却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并成为合法的公共讨论话题。^①

男性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时期妇女解放话语的批评则表现出他们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各种政策带来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感到不安和反感。从五四以来,男女平等在中国主要被理解为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平等权利,这个理解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能占主导地位也是因为它同政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发妇女人力资源的需求相一致。在公有制经济中,男女平等政策使得大批城市妇女获得教育权和就业权,并对就业领域中的社会性别界限有所突破。尽管那个时期的妇女就业政策也是将妇女当作劳动力蓄水池(谭深,1993:343—344,348—349;Anders,1983),但是城市妇女参与社会生产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妇女的广泛社会参与必然导致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教育和职业使得大批城市妇女有可能选择不依附男性的人生道路,对毛泽东时期成长的许多女青年来说,婚姻也只意味着两个平等的人的结合,而不是“从夫”的人生安排。换言之,虽然两性间的私密关系不是毛泽东时期各项政策的关注点,但是它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国家政策的影响,产生了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

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不仅是因为经济独立的妇女在婚姻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还因为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性别话语重新界定了“男性”和“女性”的内涵。继承了20世纪初中国女权主义对新女性的界定(最早的系统界定可见金天翮发表于1903年的《女界钟》),毛泽东时期主流政治话语中的“女青年”完全摒弃了儒家的“三从四德”性别规范。“女青年”作为一个主体位置,她不依附于家长和丈夫,她也并不是由家庭角色和性功能来界定的,而是和“男青年”一样由社会角色来界定。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在社会领域的出色表现是构成优秀男女青年的基本条件。虽然对男性女性内涵的重新界定表现了执政党塑造符合政治需要的公民的意图,虽然对男女的非性化的界定在实践中导致对性表现的压制,但是“女青年”这个主体位置所包含的对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是意味深长的。当然,毛泽东时期的具体的妇女的主体身份并不总是由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构成,而往往是由多种话语构成,传统的社会性别规范对具体的女青年仍会有影响。但是毕竟广大青年妇女有了不守传统妇道的合法性。如果说传统妇道维系了男性的特权,那么由国家提倡的女青年的不守妇道则直接冲击了这种特权。

公有制计划经济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作用。国家父权制的巨大权力剥夺了家庭内男性家长在历史上享有的权力,他甚至对财产都没有支配权,更无法决定儿女的职业、教育、住房,有时包括婚姻等等人生大事。“一切听从党安排”把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力降低了,而他的具有独立职业和经济能力的妻子则比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有了更多的自主权。社会性别中的权力关系的这一微妙变化是许多男性都能深切感受的。毛泽东时期知识分子整体在国家政治上的边缘化与知识男性对权力中心的向往之间的矛盾更使许多知识男性体验到一种无能为力的处境和心境。许多知识男性把自己在政治经济上的无能之感归咎于毛泽东的男女平等政策,指责妇女广泛就业导致了把男子赶进厨房使他们成了“小男人”,使中国社会失去了“男子汉”。剧作家沙叶新为电视剧《海派丈夫面面观》写的主题歌《男子汉哪里有》这样发泄着男性的怨气:“小李拎菜蓝,老王买煤球,妻子吼一吼,丈夫抖三抖!都说男人是顶天柱,谁知男人的酸苦最多,白天干活晚上奔波,心里苦惱嘴上还唱歌。小王拿牛奶,老赵买酱油,工资奖金全上缴,残羹剩饭归己属有,重活脏活一人干,任打任骂不还手。民族若无阳刚气,民族怎能

^① 李小江的《夏娃的探索》(1988)和《女人的出路》(1989)较集中地表达了80年代知识女性对这些问题的关注。

去奋斗。国家若无阳刚气,国家怎能震全球。男人若无阳刚气,男人怎能去追求!丈夫若无阳刚气,我的妻子你说是可喜还是可忧?”(王霞,1991)^①尽管许多调查证明即使在双职工家庭中,还是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多于男性,但是这不能改变许多知识男性的主观感受,与昔日同一阶层的士大夫所享受的性别特权相比,当代知识男性确实失落不少。有意思的是剧作者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来掩盖对自己的性别特权被削减的不满,似乎中国的强盛有赖于恢复男性特权和巩固社会性别等级。这样的言论并非个别,“阴盛阳衰”的感慨充斥公众话语,从80年代持续到90年代。社会学家郑也夫发表于1994年的《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最真实坦率地表露了当代许多男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百年来在社会性别制度中和社会性别权力关系中的变化的无所适从和失落感。他在文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话表达自己的感受:“婚姻的解体不是因为规章决定,而是因为福利水平破坏了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和所处的权威地位。他在自己家里不再感到男子气概……再没有比日益认识到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更加伤害这些男性的价值了。”(郑也夫,1994)显然,社会性别关系的变化还没有深刻到改变男性对男子气概的界定,男子在男权社会中的特权和地位依然被理直气壮地认定应该是男子气的内涵。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中,对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挑战也就被不少男性看作是对自己作为男人存在的挑战。^②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看80年代知识界对“铁姑娘”的抨击就更好理解了。由国家传媒宣传张扬的“铁姑娘”作为一个文化符号是对传统社会性别话语中“弱女子”的直接否定,也是对已经感到被阉割的男性的直接威胁。就在计划经济、男女平等话语、“铁姑娘”们有意无意地颠覆着几千年的社会性别秩序时,拨乱反正的时代终于到来。许多男性知识分子踊跃地加入了对毛泽东时期社会性别话语的批判,并以此开始了对社会性别的重新界定重新规范。这个重新规范的过程恰好与市场经济的起步同步进行。许多男性借批判计划经济来抨击妇女的平等就业权利,指责“妇女解放”是“以牺牲生产力的发展为代价的”,抱怨妇女就业“增加了男子的劳动时间和疲劳度”。当女性知识分子在探讨如何实现社会对妇女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劳动价值的承认时,男性知识分子声称“在社会主义‘大锅饭’里,妇女舀去了与其劳动数量与质量不等价的一勺”(常乐人,1988)。面对劳动力过剩,男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纷纷向政府献计献策,“让妇女回家”的呼声从80年代初期至今不绝于耳。他们引经据典地为妇女回家制造合法性,大造舆论。有的诉诸于生理决定论,强调女性天生是弱者,能力低劣于男性,只适合家务,而外出就业只能是降低企业效益。有的则公开呼吁中国妇女向日本妇女学习,为现代化做牺牲(刘伯红,1992;陆震,1994,1995)。直到2001年3月的全国政协会议上,还有男性政协委员提倡“女同志回家相夫教子同样是光荣的”(蒋永萍,2001)。让妇女回家的呼声决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解决就业问题的经济手段和权宜之计,它是当代中国知识男性重建社会性别等级秩序的重要运作,既集中表达了许多知识男性所信奉的男尊女卑“真理”,又强有力地巩固着社会性别等级的体制机制和观念。近20年来的妇女就业问题上的持续论战是当代中国不同社

① 但同一时期也有些知识男性对恢复传统社会性别关系的潮流做出自我感觉良好的阐释。如潘绥铭说:“1980年以来社会之所以提倡贤妻良母、和睦家庭,就是中国男性在最近三十年,尤其是文革中的社会打击下,顽强地维护了家庭,保护了女性之后,对女性要求报偿。”(1987)

② 《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第3期刊登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发展笔谈”清晰地展示了90年代女性知识分子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与一些男性知识分子的认知鸿沟。市场经济的进程以及男权文化对传统社会性别观的巩固复制使得许多女性知识分子的社会性别立场日益鲜明。

会性别话语较量的重要场所(Wang, 2000)。^①

至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社会性别理论难以进入中国知识界了。虽然有少数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权主义学术思想表现了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男性知识分子坚持马克思主义男女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念^②,但是许多有话语权的男性知识精英所选择的社会立场决定了他们会排斥一种批判和解构社会性别等级制的理论。与中国20世纪初倡导推翻男尊女卑等级制的女权主义知识男性相比(Wang, 1999),我们看到百年现代化的历程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把中国知识男性都现代化了,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中国知识界主流在社会性别问题上向前现代的倒退。

从社会性别学术领域在国际学术界发展的历史来看,女性学者始终是这个领域的开拓者和选择力量。我们分析中国学术界男性的状况并非意味着感慨男性学者没有做学术带头人,而是指出中国女性学者在这个领域的开拓将会遭遇意料之中的阻力。事实上,十多年的妇女研究没有能在学术界教育界做出重大突破本身已经说明了在中国进行这项事业的艰难。最大的难点不仅在于女性学者缺少学科建设的物质资源,更重要的是要想在身处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的学术界异军突起,对女性学者来说是对自身的学术和精神力量的巨大挑战。21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学创建的历程将是对男女学者共同的考验。

三、创建社会性别学的现实意义

社会性别理论作为剖析社会性别等级制、揭示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锐利工具已经在许多地区的知识生产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个产生于西方的理论对中国适用吗?对于这个疑问的解答并不复杂:社会性别的基本概念对一切仍保存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文化都具有批判意义;鉴于社会性别等级制的表现和社会性别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因文化和历史的不同而有差异,任何地区的学者都必须在对本土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具体研究中创造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分析批判。引进西方理论是为了建立对中国现实有意义的学术,而不是为了搬弄一些时髦的句词来提高个人的权威。从引进到创建这中间有一个艰辛的知识创造过程,这个过程只能由中国学者自己来完成。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多少实利可图,相反作为一种来自边缘的批判力量,开拓者们会遇到重重阻力和困难。只有那些真正被激动人心的学术思想所吸引的学者,那些渴求在学术上有所创新的学者,那些对实现社会公正具有责任感的学者才可能坚持下去。可以预料,女性学者将是创建社会性别学的主要力量。这不是因为女性的“本质”所决定,而是因为今日中国女性面临市场经济和知识界主流携手建构和巩固社会性别等级制的严峻局面。

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生产情况。伴随着批判文革中男女都一样的

① 在关于妇女回家问题的大辩论中,从一开始,许多女性知识分子和妇联干部就从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立场出发坚决维护妇女的利益,同主张恢复传统性别角色分工的男性知识分子进行了有效的话语较量。《社会》从1984年第1期至第4期刊登的“关于‘二保一’问题的讨论”以上海妇联主任谭弗云的批判“男尊女卑”传统思想的文章为结束语,就是一例。这场持续了近20年的斗争最近的一个突出表现围绕着“十五”规划中是否加入“阶段就业”一条展开,全国妇联在这样一个回合中又起了关键的作用。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邱仁宗教授在90年代率先组织了一系列女权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海大学社会学系的邓伟志教授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提倡创立妇女学,并始终对妇女回家论持批判态度(1983, 1995);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的陆震也多次撰文批判妇女回家论(1988, 1994, 1995)。这些例子(坚持社会公正理念的男性当然远不止这儿提到的几位)说明在有关男女平等问题上的认知差异并非由生理差异所决定,而是由社会立场所决定。

政策而出现的对“男女不一样”的强调演变发展成了强大的“女性味”话语。^① 在这个把女性界定为由其性功能决定的本质化的女人的社会性别话语中,大量的传统社会性别符号被调动起来。女人被描述为“弱女子”、“小女人”,温良恭顺忍让牺牲的贤妻良母是有女性味的好女人,等等,等等。在上海的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中,一个男性作家大言不惭地说:“在我眼中最有魅力的女人是在我说话时一言不发仰慕地看着我的女人。”女人要自觉地把男人奉为权威和偶像顶礼膜拜才能在男人眼里具有女人味,而独立自主地发挥自己才干的女性则被打入“女强人”的另册遭到嘲弄和贬抑。这类公开提倡给妇女二等公民从属地位的男性中心的言论充斥大小报刊和电视节目。与此同时,商品广告也竭力把女人作为卖点,不仅把女性作为商品的附属物来推销,还广泛地推销了带着“现代化”标签的中国传统的和西方传统的社会性别观。一个有“女性味”的“现代女性”应该年轻美貌,穿着时髦,富有性感,开着洗衣机,用着微波炉,善于消费,在消费各种现代化商品中实现女性家庭角色,获得充满“女性味”的“满足”。所有这些表现着男性欲望和商业利益的关于女人的文字、语言和形象表述,强有力地建立起对“女性”内涵的重新界定和对女人的行为的明确规范(Wang, 1998)。

80年代以来的大量文学作品也是制造当代社会性别话语的重要场所。正如文学批评家刘慧英所尖锐指出的:“随着种种禁欲主义的‘解冻’,许多传统的男权中心视角和观念得以蔓延泛滥,尤其是女性形象商业化——女性作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的欲望对象,被不断地强化着。许多文学作品和形象借着反禁欲主义这面旗帜,而重新回到男权传统的泥沼里,或者是回到商业社会中卖‘女’为生的境地之中。”(刘慧英, 2000: 2)在众多的畅销书中,男作家恣意描绘着自己的纵欲想象,而他们笔下的女性人物则成了性发泄对象和用来证明男性性能力的性工具。女性的“性”——作为被男性把玩由男性定义描述的“女性本质”——得到空前的突现。而女人作为“人”的尊严和主体性——20世纪初的中国男女知识分子所高声呼唤的——却在当代男性的写作中遭到践踏。这类作品所表现的不仅是对女性形象的肆意歪曲,还表达了当代知识男性对所谓“男子气”的渴望。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到《废都》,我们看到的是男性对女性征服欲望的扩张和加剧,政治上失意的知识男性似乎要以对女人的征服来证明自己作为男人的存在。征服女性成了“男子气”的组成部分(也是现实生活中有权势的男性所身体力行的)。旅美学者钟雪萍在分析80年代中国男性写作的《男子气被围困了吗?》一书中精辟地指出,当代男性写作中的许多性描写“很少探索性的关系,而几乎全都是关于男性的痛苦、恐惧和无常之感,这一切又都夹杂着厌女倾向和重获性能力的焦虑”。她强调对当代知识男性的这种性焦虑必须放在具体的政治历史背景中来理解(Zhong, 2000: 86)。

今日中国社会性别话语的制造自然离不开西方背景。对中国女人的要求明显地表现了中国男性“洋化了”的欲望。在坚持有“女性味”的女人应该保持“东方女性传统美德”的同时,男性对女人的身体的要求却不再传统。“三寸金莲”早已是令人不堪回首的历史,今天的“现代”女性美要“三围”达标,于是丢掉了裹脚布不久的中国女性纷纷做起美容手术。不仅是女性美要以西方为标准,男性更是在各方面要以西方男人为楷模。中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弱势使得中国男性,尤其是伴随“现代化”话语而产生的知识男性在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参杂着深深的性自卑和性焦虑。市场上铺天盖地的壮阳药并非说明今天的中国男性性无能情况比以往

^① 美国研究中国妇女的学者 Emily Honig 和 Gail Hershatter 发表于 1988 的 *Person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用翔实的资料呈现了 80 年代中国传媒制造“女性味”话语的社会景观。此书的中文译本《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删略了中国读者熟悉的中文原始资料,但保留了作者对许多现象的分析批评。

严重,而是反映了开放以来中国男性面对西方世界和西方男性神话,和他们一样强壮的渴望。实现现代化强国的欲望和加强性功能的欲望经常缠绕在一起,难分难解。“重振雄风”欲望的再表现在文学作品和商品广告中比比皆是。关于现代“男子汉”的语言、文字、形象同“女性味”话语一样在有力地建构着“男性”内涵的定义,并起着规范男性行为的作用。与“女性味”话语不同的是,“男子汉”话语没有着力提倡“东方男性的传统美德”(如孝忠悌),而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历史过程中建构的主流男子气为楷模(如竞争性和进攻性)。简而言之,在这类社会性别规范中,女人要弱(尤其在男人面前)才显得有“女性味”(这个弱的内涵是从属性依附性),男人要强(尤其在女人面前)才算是男子汉(这个强的内涵是权威性支配性再加能力);男人的强要靠女人的弱来反衬。这种社会性别规范既对女性的发展造成束缚,又对男性的身心带来过分的压力,往往男性装强比女性装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女性味”、“男子汉”话语的制造过程和对男女的实际影响是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的课题,笔者在此仅仅是提出一个初步的描述,来说明社会中关于男女的界定和再表现是有着复杂的和变动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男男女女都在无意识中受到无所不在的社会性别话语的塑造和规范,包括那些有话语权的性别话语制造者。今日由市场经济推动的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性别话语对男女都产生负面的影响,这种社会现象需要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批判和解构。在此需要强调,尽管男女都受到“女性味”和“男子汉”话语的影响,这个话语中的权力关系始终将女性置于被动、从属、物化和他者的地位上,因此它对女性,尤其是青年女性的负面影响会更严重。我们今天在展望中国21世纪的发展时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个“人”自然应该包括妇女。任何阻碍妇女发展的因素都应该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社会性别学也只有以对妇女发展的深切关注为基点才可能具有对现实的批判力量和理论指导作用。

束缚妇女发展的机制是多样的,并因地域、阶级、民族、年龄等差异而产生不同结果。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城乡等级差别使农村妇女和城市妇女有很不同的社会性别经历。就如毛泽东时代的男女平等主流话语对农村妇女影响远不如对城市妇女的影响一样,今天在城市由大众传媒商品经济推动的“女性味”话语也并未能散播到乡村边缘地带。在农村有另一套社会性别机制在规范着男女的行为,影响着男女的人生经历。国内外许多做农村发展项目的研究人员都注意到社会性别等级制与贫困的关系,女性普遍地是社会和物质资源贫乏的群体(马元曦等主编,2000;徐午等主编,2000)。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水平、生产方式、风俗习惯差异很大,社会性别等级制的机制是如何同各种因素交叉作用来实现把妇女置于底层的?我们可以从哪些体制改革着手来改变社会性别等级的各种机制,来拓宽农村妇女的发展途径?此外,今日中国的贫困妇女已经不局限在农村地区,下岗失业的城市妇女正经历着社会和经济地位急剧下降的困境。社会性别等级制在经济改革中是通过哪些机制来起作用的?除了“女性味”话语在为剥夺妇女平等的发展机会制造合法性之外,还有哪些社会过程在制造对妇女发展的障碍?当代中国社会中社会性别和阶级这两种等级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是如何作用于不同的妇女群体的?男女平等的话语(包括政府的有关政策)在改革开放时期发生了什么变化?当代妇女可以怎样调动男女平等话语的社会政治资源来推进妇女的社会进步?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巩固和发展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话语?这类有关中国大多数妇女发展的重大问题也亟需社会性别学学者的深入研究。

在过去10多年的妇女研究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表现出的长处是密切关注妇女的现实问题,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国际组织或是政府部门)也是投在为解决妇女现实问题的课题上。

但是因为缺乏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不少研究缺乏对深层社会文化体制结构的剖析力度。在笔者同许多妇女研究学者的交流中,深切地感受到广大妇女研究者对理论和方法的强烈需求。这种状况的存在正是因为我们还未能把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起来,这种状况的存在也正呼唤着社会性别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国际学术界已经在这个领域中产生了大量的学术著作,虽然绝大部分不是分析中国社会性别制度的,但是了解这个领域的学术发展必然会打开我们的思路,促进中国的社会性别研究。了解国际学术发展是我们建立中国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必要步骤。中国学者了解国际学术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是语言(这也是这门学科发展缓慢的一个因素),为此我们需要有大批具有翻译学术著作能力的学者投入到翻译介绍社会性别学的工作中。

社会性别学的建立不仅是为了妇女研究者能更深入地分析中国妇女问题和社会性别制度。它作为一个新的知识领域,是在挑战、质疑、批判、解构传统知识体系的过程中产生的。它不能游离于学术界,而是要把各门学术作为自己的基本领地,一寸一寸地清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性别学学者不能仅仅是在社会上参与促进妇女发展的项目,还必须在学术领域中以自己的学术著作来颠覆和改造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来创造从新的观察角度和社会立场出发的新知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来是由男女共同参与的。但是作为对人类发展历史的认识在以往主要是由男性来表述的,或者说被记录下来的人类认识主要是男性的声音和男性的经历。社会性别理论启发我们去想象和开创一个包括女性的认知世界。我们不仅需要探究女性在历史上的作用、经历和感受,还需要考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中不同的社会性别关系和社会性别制度的建构和演变,以及它们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不仅要从事社会性别角度去考察社会历史,还要从社会性别角度去审视我们所继承的人类知识。在国际学术界,赋予人类知识体系社会性别的结果是产生了新的认知结构。今天我们中国学术界对这一新认知结构和新知识内容尚缺乏了解,离开创自己的新知识尚有一段距离。在我们所追求的“现代化”中,恐怕实现对人类社会认知结构的“现代化”是学界所面临的紧迫任务。

同任何学科的建立一样,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也必须以高等教育为体制基础。高校中要有社会性别学的课程,使得对社会性别研究有兴趣的学生能获得必须的基本知识和研究训练,为日后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培养青年学者是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的关键。但是在今日中国高校中严重缺乏能够开设社会性别学的师资,师资培训因此成为学科建设的关键。令人欣喜的是,参与“发展中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课题组的学者们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从1999年以来,她们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多次举办读书研讨班,对高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研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当然这个培训也完全可以自我培训创造的过程。美国妇女学开创初期就是在高等院校里一些女教授和女学生共同就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进行阅读讨论写作,然后逐步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发展起一门门课程,最后形成了跨学科的妇女学专业。我国高等院校中已经有几十个妇女研究中心,每个中心都有不少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如果这些中心的目标不仅是从事一些妇女研究课题,还争取课程设置,使妇女和社会性别学进入知识和教育体系,那么我们的学科建设进程可能会加快一些。

应该看到,在高校中设置社会性别学课程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学术建构,其本身对改变教育内容有重大意义。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至今还很少包括国际上从社会性别角度创造的新知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妇女研究的成果也极少能进入课堂。21世纪的中国高校学生应该具有国际学界开创的新知识结构,也应该对占人口一半的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有所了解。具

有社会性别视角的新知识能够给予学生的不仅是对人类社会和自身状况更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够培养起学生批判的精神和独立分析的能力。在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制造新的文化霸权垄断人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时,培养有批判分析能力和独立意识的人应该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此外,社会性别学课程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性别觉悟。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是长期的事业,高等教育有责任培养出具有社会性别觉悟的人才在社会各个领域有意识地从事社会变革。社会性别学的课程设置不仅可以面向高校学生也可以面向妇联干部和从事各种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研究项目的人员。未来高校的社会性别学应该成为实际问题研究人员的培训基地。

最后要对这门学科的名称做个说明。在国外,从事社会性别学教学的机构大多数称为妇女学,有一些称为社会性别学,而有一些研究机构则两者兼顾,称为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最后这个长的名称是为了声明:对人类社会研究引进社会性别视角不意味着一种中立的立场,鉴于目前在大部分文化中妇女依然处于社会政治经济的边缘,社会性别学应该坚持对妇女这个弱势群体的关注。笔者完全赞同这个立场。为了追求文字简洁,为了突出社会性别这个新概念,本文中用了社会性别学。谨希望读者理解:社会性别学是以挑战男性中心的知识体系为核心,以高等教育领域为重要基地,以改造社会性别等级制和一切等级制并开创有利于妇女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目标的一门社会立场鲜明、实践性强的学术,它欢迎男女学者的平等参与,并追求在开创一个新的学术领域过程中在学术界以及社会中建立起新型的社会性别关系。

参考文献:

- 艾米莉·韩尼格、盖尔·贺肖,1999,《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女性》,陈山等译,陕西人民出版社。
- 白井厚(日),1982,《争取女权运动的历史和妇女学》,何培忠译,《国外社会科学》第4期。
- 邓伟志,1983,《“妇女退居家庭论”质疑》,《文汇报》6月10日。
- ,1985,《完善和发展妇女学问题》,《妇女指南》。
- ,1986,《迎接妇女学的黄金时代》,《中国妇女报》1月27日。
- ,1995,《妇女学呐喊》,澳门出版社。
- 常乐人,1988,《优化配置和最佳分配》,《中国妇女报》7月11日。
- 蒋永萍,2001,《世纪之交关于阶段就业/妇女回家的讨论》,《妇女研究论丛》第2期。
- 金天翮,1903,《女界钟》,大同书局。
- 李敏,1984,《谈谈妇女学》,《社会》第3期。
- 李小江,1986,《改革与妇女》,《婚姻与家庭》第11期。
- ,1988,《夏娃的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
- ,1989,《女人的出路》,辽宁人民出版社。
- 刘伯红,1992,《关于女性就业问题综述》,《中国妇女理论研究十年》,中国妇女出版社。
- 刘慧英,2000,《90年代文学话语中的欲望对象化》,《中国女性文化》第1期。
- 陆震,1989,《略论妇女就业》,《社会学》第4期。
- ,1994,《妇女就业问题之我见》,《妇女研究论丛》第3期。
- ,1995,《热点争鸣:妇女就业问题研究》,上海市妇女学学会等编:《妇女研究在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
- 马元曦等主编,2000,《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三联书店。
- 孟晓云,1986,《当代中国妇女面面观》,《人民日报·海外版》1月8日-10日。
- 闵冬潮,2000,《欧共体各国妇女研究学科化的几个问题》,李小江等主编:《批判与重建》,三联书店。

- 潘锦棠, 1988,《妇女解放的实质与标志探析》,《中国妇女报》5月27日。
- 潘绥铭, 1987,《中国新女性面临的选择与得失》,《中国妇女报》1月19日。
- 谭 深, 1993,《社会转型与妇女就业》,杜芳琴主编:《妇女与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
- 陶铁柱、谭 深, 1987,《男女同步时代的理论探究》,《社会学研究》第6期。
- 王 霞, 1991,《海派丈夫面面观》,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 政、杜芳琴主编, 1998,《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
- 奚杏芳, 1985,《建议开展“妇女学”研究》,《中国妇女》第12期。
- 徐 午等主编, 2000,《社会性别分析: 贫困与农村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
- 张晓崧, 1988,《对“男女平等”口号质疑》,《中国妇女报》5月16日。
- 郑也夫, 1994,《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学研究》第2期。
- Audors, Phyllis 1983,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of Chinese Wome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Boxer, Marilyn Jacoby 1998, *When Women Ask the Questions: Creating Women's Studies i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00, “Unruly Knowledge: Women's Studies and the Problem of Disciplinarity.” *NWSA Journal* 12; 2.
- 2001, “Les women's Studies aux États-Unis; Trente ans de Succès et de Contestation.” *Clio: Histoire, Femmes, Société*, No. 13.
- Christ, Carol T. 1999, “The American Universities and Women's Studies.” in *Women: Images and Realities*, (eds.) by Amy Kesselman et al, May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 Honig, Emily & Gail Hershatter 1988, *Personal Voices: Chinese Women in the 1980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Zheng 1998, “Research on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in *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eds.) by Gail Hershatter, et al,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 1999,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0,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eds.) by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Routledge.
- Zhong, Xueping 2000, *Masculinity Besieged? Issues of Modernity and Male Subjectivity in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Duke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系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
责任编辑: 谭 深

国际社会学机构第 36 届会议将在北京举行

国际社会学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ology)第 36 届会议将于 2003 年 7 月在北京举行。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启动。秘书处地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科研处, 电话及传真: 010—65138276。网页: <http://www.iis2003beijing.com.cn> 详细报道见下期。